

特約撰述

國際關係和平主義的回歸

The Return of Pacifism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ichard Jackson

壹、前言

所謂「和平主義」(pacifism) 乃是一種反對戰爭建置和實踐的政治途徑，並承諾推動和平的政治建置與社群。和平主義有許多的種類，有些反對任何或所有形式的暴力，其中亦包括人際之間的暴力在內，有些則主要反對特定形式的戰爭，例如：核子戰爭和國際戰爭。今日，「和平主義」和「非暴力」(nonviolence)，一個用以描述從事政治抗爭 (political struggle) 方法的名詞，則被交互用來描述反對直接且具結構性暴力的政治，當中亦包含環境暴力，以及一種從事政治性抗爭的方法，卻又不涉及任何肢體上的暴力。¹

本文主要探索「和平主義」和「非暴力」做為國際關係的理論和實踐，為什麼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卻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受到打壓和被人們遺忘，以及其又如何因被視為是解決當前世界問題的替代途徑而再次崛起。在一個充滿高度軍事主義、民粹主義擴散、民主遭受威脅、不平等現象充斥和潛藏氣候變遷劇變等特色的國際體系中，人們對於安全、衝突、和政治新途徑的需求其實從未停歇。「和

¹ Stellan Vinthagen, *A Theory of Nonviolent Action: How Civil Resistance Works* (London: Zed Books, 2015).

平主義」和「非暴力」為政治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模式，並為新途徑的發想和新政策選項的提出創造一個討論的空間，目的在於達成不同人，以及不同人和環境之間的永久性和平（sustainable peace）。

貳、對和平主義與非暴力的抑制

回顧過去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和平主義和非暴力的理想和理論其實是失敗的，即便他們對國家和社會行為具有影響力，那麼其影響力也可能非常的微弱。在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之後，國際體系隨即陷入了程度和規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衝突，期間歐洲猶太人遭到屠殺，德國境內的城市遭受地毯式轟炸，亦有南京大屠殺和日本的原爆，更有數之不盡的暴行。然而，二戰結束之後的數年內，世界又進入了冷戰時期。冷戰期間核戰邊緣和間歇性危機頻仍發生，非洲、亞洲、拉丁美洲、歐洲和大洋洲更發生了近 300 場的主要戰爭和衝突。

今日，持續 17 年之久的反恐戰爭吞沒許多位於中東和北非的國家，其中包括敘利亞的悲劇性戰爭，超過百萬人因戰爭而喪命，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更有許多人因戰爭而遭受虐待、監禁和死於無人機的攻擊。²上述的紀錄和各國對於軍隊和武器的持有，說明了全球軍火交易仍持續的成長，暴力和衝突仍持續發生，例如葉門內戰以及激進組織伊斯蘭國對於中東地區的威脅。我們似乎也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結論，那就是和平主義和非暴力仍然是一個和政治不大相關的途徑，戰爭和暴力乃人性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亦是國際政治的常態。

² Richard Jackson, "Commentary: *Groundhog Day* and the repetitive failure of Western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nsight Turkey*, 17:3(2015), pp.35-44.

然而，這個結論隱瞞了一個同等重要的歷史，亦即在過去一世紀中，思想家、行動主義者、許多的團體和政府曾採用和平主義和非暴力的方法來處理問題，並對世界產生真實的影響。雖然史書不曾提及，媒體和大眾文化亦常忽視，但現實是和平主義和非暴力在當代歷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持續成為改變世界政治的一股力量。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和平主義者影響並引領數千名在英國、澳洲、紐西蘭、美國和其他許多地方的人士發起拒絕參與戰爭的良心運動。和平主義和非暴力也曾出現在許多解除武裝的運動裡，以及提倡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設立的努力中。在這些國際組織中，人類限制國家發動戰爭權利的嘗試初嘗勝果。

和平主義者在草擬國際人道法與公約，以及建立衝突解決的和平機制上也非常地成功：例如，海牙國際法院的設立。事實上，現今許多關於國際法的基礎，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成立，和許多關於人權與解除武裝議題的國際性運動和規約，都可以視為是和平主義者於一戰前後反對黷武主義（militarism）和戰爭所做的努力。近期和平主義者更引領全球對抗核子武器，並取得些許的成果，其中包含國際法院對國家擁有核武和使用核武適法性問題的反對。

二戰期間非暴力抵抗運動出現在丹麥和荷蘭等納粹佔領下的歐洲國家，並曾經解救上萬名生活在保加利亞和其他地區猶太人的性命，卻鮮少為人們熟知和研究。戰後，甘地等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在印度和世界各地領導非暴力反殖民的運動，並對全球秩序產生深遠的影響，歐洲殖民國家被迫必須放棄他們的帝國野心。同樣地，非暴力運動在推動種族和社會正義上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馬丁路德金恩在美國領導的民權運動，以及南非、波蘭和一些拉丁美洲國家人民爭取政治自由的努力。

更廣義而言，在過去數十年裡，非暴力的運動已令許多國家的獨裁者下台，並在爭取自由和人權上獲得具體的成果，³例如菲律賓人民權力運動（People Power Movement）迫使馬可仕政權下台，葡萄牙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終結了軍事獨裁的統治，波蘭、捷克、東德、烏克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蒙古和波羅的海諸國境內的和平革命亦推倒了共產鐵幕和蘇聯的鐵腕統治。⁴除此之外，在蘇聯瓦解和冷戰結束之後，非暴力革命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下席卷了非洲和許多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亦連帶地促使這些國家或地區進行轉型。近期，我們更見證了阿拉伯之春的非暴力運動席捲中東和北非地區，以及發生在東歐國家的一系列顏色革命。

在文化和政治理論層次上，為人熟知的歷史和平主義者如托爾斯泰（Leo Tolstoy）、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甘地（Mahatma Gandhi）、羅素（Bertrand Russell）、赫緒黎（Aldous Huxley）、布伯（Martin Buber）、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布里坦（Vera Brittain）、蘇菲索爾（Sophie Scholl）、達賴喇嘛（the Dalai Lama）、金恩（Martin Luther King）、戴伊（Dorothy Day）、查維斯（Cesar Chavez）等，仍持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力。今日，在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的領域中，非暴力運動的研究正快速發展，許多關於和平主義和非暴力抵抗的書籍、期刊和研討會亦相繼出版和召開，這意謂著和平主義已走出被打壓的狀態，並開始受到世人的關注。

當代學者們運用和平主義來探索許多的議題，如：戰爭與武力行使的道德議題、政治中關於權力和抵抗的本質、集體行動的代理

³ 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⁴ Kurt Schock, *Unarmed insurrections: People Power Movements in Non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人問題、非武力維和行動和非軍事性國家防禦的可能性、激進非暴力政治的理論、和平主義式的和平建立（*pacifist peacebuilding*）、無政府主義的和平主義等（*anarcho-pacifism*）。換言之，客觀地回顧過去一世紀以來世界政治和歷史的發展，和平主義和非暴力已具備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並以積極正向的方式來形塑國際體系、戰爭和黷武主義，即使這些努力鮮少為人們所知。

除了和平主義和非暴力在歷史上的影響和重要性，以及其做為一種國際關係理論的長處外，無庸置疑，和平主義和非暴力特別在德國納粹崛起和二戰後歐洲社會中長期處在被邊緣化位階，被普遍認為是天真、不切實際、過時、甚至是不道德和危險的。然而，個人研究顯示，雖然和平主義已達成某些成就，並對世界產生實際的影響，但不論是學術界、政界、媒體乃至於一般人皆刻意忽視，或是公開鄙視、詆毀和平主義理論和其相關實踐。⁵因此，和平主義鮮少被國際關係研究者所接納，或是被編入大學的教材，而主張自己是和平主義者的研究者更常遭受到他人的訕笑和嘲諷。

再者，許多人對和平主義做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主題存有不少的迷思和刻板印象，例如：和平主義僅反映單一旦絕對的道德態度，因為其拒絕任何的武力與暴力，因此和平主義對於政治和社會而言並不合宜；和平主義是一種消極的態度，因為當面對暴力攻擊時和平主義選擇不作為；和平主義是不道德的，因為為了信守個人原則，和平主義對遭遇危險之人袖手旁觀；和平主義是無效的，特別是面對像納粹希特勒等在武力上具壓倒性優勢的敵人；和平主義對於人性和邪惡本質的看法太過天真和不切實際，因此和平主義對

⁵ Richard Jackson, "Pacifism: the anatomy of a subjugated knowledge," *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 6:2(2018), pp.160-175.

於討論真實世界所面臨的暴力和威脅是毫無貢獻的。然而，如同我以及其他研究者所主張，這種種的迷思和偏見是不為嚴謹的學術研究和討論所接受的。⁶

參、和平主義和非暴力的呼籲

在任何情況下，我想在這篇文中強調的重點是和平主義和非暴力不單僅是一個可靠的道德和政治行動，更可被運用來處理現今國際關係中因持續性暴力和黷武主義而衍生的種種問題與挑戰。我同時也想建議，過去一世紀中從未出現像現在這般需要和平主義做為一個國際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歷史性時刻。

首先，如同我已提示，假若你檢視和平主義的哲學、實證和道德基礎，那麼毫無疑問地，和平主義和非暴力與現實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關於政治的哲學與實踐途徑並無太大的差異。特別是，在關於戰爭和使用武力的準則上，和平主義相較於今日國際關係主流理論討論中任何自由的義戰理論來說可能更可信、更一致且更加地實際。⁷

再者，暴力的代價，例如戰爭造成的苦難經歷、武器擴散、高壓的政府，以及全球性軍事支出，和因武器研發所投入的人類和科學資源等，皆使得尋找和平共生和解決爭端與衝突的方法成為當前所迫切需要的事情。過去一世紀所發生的戰爭奪去超過百萬人的性命，造成無數的難民和無家可歸的人，以及無已計算的環境、文化和發展上的損失，更使得人類失去改善社會福利與促進人類福祉的

⁶ Richard Jackson, "Pacifism and the ethical imagin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irst published online, 12 December 2017; Robert L. Holmes, edited by P. Cicovacki, *The Ethics of Nonviolence: Essays by Robert L. Holmes*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⁷ Michael Neu, *Just Liberal Violence: Sweatshops, Torture, War*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機會。而這種在文化和實踐上對於軍事暴力的支持已然在世界的政治、娛樂、歷史和價值系統中衍生，即便是像一戰和二戰等上一個世代的戰爭，仍持續成為今日新戰爭和新衝突的原因。這也促使我認為，我們現正處於一個自戰間年代以來（inter-war years）實踐非暴力與和平未來最佳時刻的主因；1918 年以後以戰止戰被視為共識，但和平被認為是戰爭以外另一替代途徑。在此，我提出對於和平主義和非暴力回歸抱持樂觀立場的四個主要理由。

首先，學者們和全球廣泛大眾已開始認識到暴力和使用武力做為政治工具的明顯限制和失敗。雖然兩次的世界大戰、近三百場地方戰爭，以及近期反恐戰爭等實例皆顯示暴力並無法帶來和平和安定的世界，學術研究仍試圖以更精確的方式來揭示暴力使用的無效性，以及行使暴力是不成功的。⁸由學術研究中得知：具有優勢軍力的國家並非總是能夠在戰爭中勝過軍力較弱的國家，以及強國已不如以往一般總能在戰爭中獲得勝利；透過暴力形式達到政治和社會的改變是很難獲得成功的；恐怖主義鮮少達成其目標；使用暴力的方式來打壓反政府的抗爭並不具成效；虐待和無人機的使用未能有效遏阻恐怖主義；執行死刑並不能嚇阻犯罪等。簡言之，我們越來越能確信暴力並不有效，特別當暴力被用來達成像是永久和平或是特定民主文化的正向目標時。雖然暴力做為一種毀滅、製造混亂和打壓的工具確實有效，但它不能令社會變得更和平、更公義。

我們更加確信暴力的使用並不能迫使人民順從，政府和恐怖主義團體並不因具備主宰他人生死的能力而使其更加強勢，而且使用暴力做為一種政治的工具將會產生無以預期的結果。現實是暴力的

⁸ Dustin Ells Howes, "The failure of pacifism and the success of nonviol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2(2013), pp.427-66

使用將使得人們趨向順從或是抵抗，也可能使人們感到絕望或是暴怒；因此，對於暴力的回應是不可測的。然而，來自同意或是勸說力量則更具建設性和可預測性。這是因為權力來自於關係，而暴力摧毀關係。換言之，暴力的實踐事實上摧毀了政治權力的基礎。

我們也知道，軍事武力從來就不能被當作是一種治國方略的工具，特別是其被用來達成某些像是為了安全、人道干涉或是顛覆敵對政府等有限的目的時。因為武力的使用需要其他結構的支持，包含了武器的供應商和製造者，軍事科學家和訓練有素的士兵，醫療的支持，和社會大眾對於戰時國家暴力和犧牲的同意。國家使用軍事武力的能力需要永久的戰爭結構，而透過這種方式，不同於一種工具，暴力的使用事實上建構了新的軍國主義社會。暴力不能被當成是一種工具，因為目的和手段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行動的目的總是與手段相關。所有事件的發生就像是一種因與果的循環鏈，永不止息。甘地曾經提到：「我們無法透過植栽有毒的種子來取得玫瑰…手段就像是種子，樹好比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種子和樹之間的關係是相連的，種什麼因，得什麼果」。這也是為什麼戰爭會導致更多戰爭的原因。

與此相關，解暴力的本質其實是反民主的，而且很多時候也有違於政治。例如軍事武力的使用需要權力的集中，對命令、長官和階級制度毫無疑問地順從，以及對於理性討論和對話的排斥。相反地，非暴力的政治運動是民主和參與的，並源自於對話和討論。對話和討論是政治活動的根本，也正因此與暴力相對，暴力抹煞了真誠的對話。

最後，我們知道暴力的使用對道德構成嚴重的挑戰：暴力將人視為是達成目的的手段；而這種關係是不可逆的，因此需要道德上

的確信和絕對地信服；對暴力犧牲者而言，它是絕對權威、羞辱的和改變世界的；同時，暴力也需要在道德上去建構所謂的敵意，巴特勒（Judy Bulter）曾指出「可哀和不可哀的生命」。⁹這意味著透過語言、文化和人類不同類別的法則來建構：哪些人值得受保護，那些人可以被合法地殺害而不需為其死亡而悲傷或懊悔。這種倫理分類的建構也是暴力之所以可以被預測的基礎。

對於樂見國際關係和平主義回歸的第二個理由是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非暴力做為一種政治力量具備很多的優點，亦不乏許多成功的案例。切諾維斯（Erica Chenoweth）和史蒂芬（Maria Stephen）在其突破性的研究中比較了過去一世紀中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和暴力抵抗運動。研究中一些重要而有趣的發現包括：在達成目標上，即便是像政權移轉或讓渡等極大化的要求，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是暴力運動的兩倍；非暴力運動，即使最終失敗了，仍往往促使社會走向更民主，並更注重人權，而暴力運動後的社會通常具有反人權和不民主的特色。埃麗卡切諾維斯和瑪莉雅史蒂芬的研究震驚了國際關係的研究者，因為兩者的發現挑戰了國關學者對於暴力是促使改變最有效的手段，以及可以提供保護和國家安定的普遍認知。之後許多的研究也確認了兩人最初的發現。

其他類似的研究也證實對於恐怖主義採取非暴力的回應，相較暴力回應，在降低恐怖主義威脅上是比較有效的；非武裝的維和行動者，即使身處於殘酷的內戰中，其在保護平民上是更有效的；在暴力衝突期間，社群團體可以使用非暴力的方式來創造和平緩衝區。換言之，學者和研究者們正開始去累積可觀的證據來證明非暴

⁹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2004).

力在實現政治改變，保護平民，創造安定的非暴力社群，乃至於國家的自我防衛上都具有高度的成效。由此觀之，如同學者們，我們更了解非暴力實際上提供除了戰爭和使用武力之外其他可能的替代途徑。

同時，我們也了解到非暴力與和平主義相對於武力的使用更具道德性：他在目的和手段之間維持一致性；它將人視為是最終的目的，並維持人性的尊嚴；它是一種可逆並以謙遜為基礎的行動，不主張道德確信（它包含了對於真理的試驗和追尋，而非伴隨殺戮發生的確信）；他是民主的和直接民權的。

對於非暴力的成功和其優點的知識正在世界各地傳遞，許多過去從事暴力運動的團體也選擇放棄武裝鬥爭，並考慮非暴力抵抗的運動。思考如何透過和平手段來達成政治改變，以及行動者們對於這種思維的共同認知皆說明當前是國際關係研究認真並嚴肅看待和平和非暴力理論與實踐的絕佳時機。

第三個樂見和平主義回歸的理由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組織之一的羅馬天主教廷，已在近期拒絕了所謂的義戰理論（*Just War Theory*），並準備擁抱非暴力做為主要的道德立場。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因為天主教廷不僅長期以來透過義戰理論來支持戰爭的道德性，教廷在世界各地也有上億的信眾。

最後，我所以樂見和平主義回歸的原因是我意識到目前全球正有一股對世界秩序感到不滿的浪潮，拒絕菁英統治、黷武主義、自由的資本主義，以及對於環境的破壞。這股浪潮可以追溯至 2008 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佔領運動。這股風潮導致民粹主義的興起，排外主義的興盛，和許多地方的新法西斯主義，我們也可在許多地方發現有為數眾多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人）意識到不平等、黷武主義、和

氣候變遷等議題的關聯性，並試圖去改變他們所身處的社會和國際體系。身處在這改變和抵抗並存的特殊時刻，促使我們去進一步討論和探索透過非暴力與和平主義方式進行社會轉型和政治妥協的可能性。

肆、結論

從我關於和平主義與非暴力的簡要分析中可以歸納出一些結論。首先，與早先一些時期類似，和平主義和非暴力的途徑與理論再次對真實世界中的人民力量運動或是一些國家產生影響，即使許多的國際關係學者並沒有很認真將其看做是合理的理論和國際政治的實踐。然而，重要的是和平主義與非暴力對於現今我們所面臨的挑戰確實提供了新的觀點和可能的政策選項。在使用軍事武力來回應威脅和危險等議題上，和平主義的回歸允許我們去考慮更多的非暴力選項，而這些選項可能更有效，更有可能實現持久的和平，而非只是短暫的穩定。

和平主義者所倡導的非軍事化概念可以協助國家處理因為不平等和氣候變遷問題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以哥斯大黎加為例，該國在1949年內戰之後放棄建立常備軍的構想是有指導意義的。哥斯大黎加在放棄建立常備軍後，其軍事預算被用於安全、社會福利和文化等項目，並有顯著的成效。英國衛報近期一篇文章中提到：

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每隔幾年會提出快樂星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該指數以平均壽命、福利、平等為指標來衡量所謂的進步，而非狹義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並以這些指標來衡量人類對生態的影響。哥斯大黎加總是名列前茅，人均壽命79.1歲，福利排名全球前7%。哥斯大黎加的表現與許多斯堪

地那維亞國家不相上下，甚至勝於美國。哥斯大黎加雖然是國內生產總值僅 10,000 美元（7,640 英鎊）的國家，平均值低於美國的五分之一，卻可以達到如此的成就，實屬不易。以此觀之，哥斯大黎加是世上經濟效能最好的國家：以相對較低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高標準的生活，並對環境造成最低的傷害。

這篇文章進而對哥斯大黎加不凡成就的理由提出解釋：

哥斯大黎加的經驗說明：每個人，不論收入多寡，都應該擁有追求更好、更高品質社會服務的基本權利。在 1940 年代，已有一些進步的國家開始去推動健保、教育和社會安全，並在 1950 年代開始大力提倡並普及化至全民，而這些努力都始於放棄軍事，並將資源運用在社會開銷上。

哥斯大黎加並不是世上的烏托邦，它證明了和平主義所提倡的非軍事化和和平的構想開啟並提供決策者新的可能性和選項。由此觀之，同時也如本文所強調的，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國際關係研究者和分析者必須認真看待和平主義回歸的問題。除此之外，決策制定者亦必須思考伴隨和平主義和非暴力途徑政治而來的可能利益。

（翻譯：崔進揆）